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 唐代古文运动发微

房本文·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非外借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项目名称：山东科技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2014RCJJ046

# 唐代古文运动发微

房本文·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古文运动发微/房本文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8. 9  
(中国古代文学论丛)

ISBN 978-7-5664-1711-4

I. ①唐… II. ①房… III. ①古文运动—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I209.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0427 号

# 唐代古文运动发微

Tangdai Guwenyundong Fawei

房本文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9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ISBN 978-7-5664-1711-4

策划编辑:李加凯  
责任编辑:李加凯  
责任印制:陈 如

装帧设计:李 军  
美术编辑:李 军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 绪 论

## 一、研究史回顾及反思

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多种体裁并行发展,除唐诗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外,唐代的古文也为后世树立了新的规范,影响深远。因此,学界也就对唐代古文运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这种长期关注,使得关于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因此,笔者对学术史不作过多的描述,仅就其基本脉络略作勾勒,而将着重点放在相关反思以及可能作进一步研究探讨之处。

虽然古人已经有不少关于唐代古文的分析与讨论,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还要从 20 世纪上半叶算起,且“古文运动”一词也不见于古籍,而是在 20 世纪的研究中才被提出,并逐渐被广泛使用而成为共识。胡适在 1927 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中第一次将“运动”这一概念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当中,但其主要用于诗歌方面的讨论,尚较少涉及散文。到 1932 年 4 月,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列有《唐代的文学运动》一章,并第一次提出“古文运动”这一名词。此后,刘麟生《中国文学史》、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中都专列了《韩柳的古文运动》一章,而郑振铎于 1932 年 12 月出版的《插图本中国

文学史》中连列《古文运动》《古文运动的第二幕》两章，全面讨论了唐宋古文的发展与成就。此时的“古文运动”已经开始成为专有名词并被学界普遍使用。例如1935年，燕京大学国文系王锡昌之学位论文即以《唐代古文运动》为题；194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龚书炽的《唐宋古文运动》一书。

新中国成立以后，除了钱冬父先生在1962年出版过《唐宋古文运动》一书，以及其他学者发表过少量有关古文运动的论文外，相关研究长期沉寂。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古文运动的研究才开始全面展开。尤其是在80年代前半段，短时间内出现了大量研究古文运动的专文专著，具体到唐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孙昌武先生的《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先生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等。其他一些学者也在各自的著作中对唐代古文运动有过不同程度的关注，如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就曾专章讨论“行卷对推动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这一时期，关于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颇多整体、宏观上的考察。在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古文家的出身以及文化品格、古文运动的源流与分期等方面都有不少创获，初盛唐散文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关系也开始得到普遍关注。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为学界关于古文运动的认识定了基调。因此，从80年代后期开始，关于古文运动的宏观考察迅速减少，转而进入精耕细作阶段，针对作家作品的具体研究日渐增多，尤其是在重要作家的研究上，成果极为丰富。而在唐代古文运动的整体研究方面，具有一定深度和新见的成果虽然仍时有出现（如葛晓音先生1987年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罗宗强先生1988年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得与失》等），但就总体而言，已经难得一见。直到目前，这一格局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

可以说，在古文运动研究方面，目前学界关于作品本身和作家个人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富。因此，为了避免过多重复前人的工作，本书除了必要的焦点透析与具体的细节探讨外，不会将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具体作家作品上，而是主要对创作主体及其当时的生存环境进行考察，探讨作品、思潮产生的原因，以及古文运动兴衰背后的影响因素，以期能有一些新的创获。因此，本书可能更多地结合社会文化背景进行研究，而文学本身的探讨则相对较少。考虑到当下对古文运动进行宏观把握的研究尚有欠缺，本书研究无疑是有一

定意义的。

古文运动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而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关于古文运动的反思也早已有之。首先就是“古文运动”的说法是否成立?1985年,罗联添先生发表的《论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文中,便对“古文运动”的提法本身产生了质疑,认为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运动”,所谓“古文运动”只是“近代人受时风潮流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名词”,“唐代古文家,对古文只是个人倡导,若干人附和而已,算不上什么运动”。此后,日本学者东英寿在其《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一书中提出,“运动”一词是现代人的概念,用来命名中唐以降的文学革新,很可能造成对古代文学现象的误解。小野四平也在其专著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认为唐代古文很难担得起“运动”之名,若真要提“运动”,恐怕只有到北宋欧阳修以后才足以当之。总的来说,在研究愈发深入的今天,概念本身造成的误解已经越来越少。在“古文运动”一词已经为学界所习用的今天,在尚未找到更合适的称号之前,似不必在字面上过于纠缠。但是,我们在作具体研究时,却还是应当注意不要陷入惯性的误区。正如葛晓音先生所言:“古代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还是有不同之处的。以‘运动’而言,现代的‘运动’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唐宋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都是今人加在古人头上的,其时未必有甚么‘运动’的意识,所以摆脱今人的思维模式,更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古文运动’的具体背景、内涵及其意义,倒是可以有所深入的。”这样的态度,无疑要通达得多。

“古文运动”一词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如果我们结合时代背景来看,便很容易发现这一提法与当时文学、文化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最早提出“运动”的胡适,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而拓展这一概念的郑振铎,也是白话文写作的健将。可以说,“古文运动”一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新文化运动”类比思维的产物,而与之相应的,古文运动的研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文化运动思维定式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强调斗争的思维模式,就像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对立一样,将“古文运动”也简单地理解为“古文”对骈文的斗争。由于宋代以降部分道学家、古文家对骈文的种种偏见,加之近代中国严重的内忧外患,以及新中国成立后长期的政治思维

影响,学界对古文运动的研究也每每从骈散斗争乃至阶级斗争的角度进行考察,而较少将两者结合起来讨论。反对骈俪固然是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对于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如果片面强调对立的一面而忽视统一的一面,其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差。

事实上,早在 80 年代关于古文运动研究的热潮中,便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反思。1982 年,马积高先生就曾在《求索》上发表《论柳宗元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兼论唐代古文运动》,认为古文运动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反骈体文”这一项,进而打破思维定势,尝试从文体的角度重新思考古文运动。此后,葛晓音先生也在《古文成于韩柳的标志》一文中指出,古文运动存在着另一个方面,即古文自身的发展、革新。陈幼石先生在《韩柳欧苏古文论》中也提到:“韩愈所一再重申的复古主题应是和以前萧颖士和李华的复古运动清楚地区别开来。这是一种在古文运动本身内部的改良运动,而不是以前那种针对骈文传统的古文运动。”这类反思虽然不多,却无疑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古文运动的其他思路。将“古文”简单地等同于“散文”并视作与骈文对立的文体,这一观点已成为主流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上述反思却多少有些被忽视了。

尽管在后来学者的研究中,这些反思的意见并没有成为主流。但是,在思维逐渐摆脱政治因素影响而日趋开放的今天,我们又确有必要对此进行重新审视。事实上,至少在唐代,古文家对待骈文的态度可能并不像后世那样严苛,而如韩、柳等人,还都是骈文写作的高手。一味地强调古文与骈文的对立,不但会在一些具体讨论中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更会对深入理解古文运动本身造成不好的影响。通过检索最近几年的博士论文发现,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尝试跳出骈散对立的模式,甚至开始对古文家的骈文创作进行专题考察,如沙红兵先生的《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等。虽然许多相关成果仍局限于个体,但这还是为进一步理解古文运动中的骈散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除了对骈散斗争的简单化处理之外,当下唐代古文运动研究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对古文家群体特征的关注不够。前面已经提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宏观研究迅速降温,学界的关注点基本上集中在个别古文大家的身上。据朱迎平先生统计,在关于唐宋古文

研究的既有成果中,关于唐宋八大家的已经占到了90%。而且,即使是在对唐代古文运动作宏观考察的研究中,也往往会局限在不同古文家文论异同的分析比较上,而较少从其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方面进行讨论。由于这种重个体轻群体的倾向,一方面,对个别作家的探讨几乎已经细致深入到难以为继的程度,另一方面,对唐代古文运动的整体评价与体认始终无法突破80年代研究所奠定的基调。

事实上,对于古文家的群体特征,并非没有人关注,早在20世纪40年代,罗根泽先生便在其《隋唐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唐代古文家多是北方人,并且认为古文运动“实是以北朝的文学观打倒南朝的文学观的一种文学革命运动”。此后,罗联添先生在《论唐代的古文运动》一文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考订与发挥,不但关注了古文家出身的地域问题,还开始对其家族、世系等进行追索。1999年,陈弱水先生发表《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一文(2008年又有小幅修订)<sup>①</sup>,在罗根泽、罗联添等先生关于古文家籍贯、经学素养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古文家的出身背景进行分析,将之与唐代士族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古文运动的宏观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

长期以来,受政治因素及主流观点影响,内地学术界对士族的看法与港台及海外多有不同。尤其是在90年代之前,常常将士族与腐朽、堕落、奢靡等贬义词联系在一起,片面强调其对文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具体到唐代,更是突出寒庶阶层对文学发展的作用,甚至有许多学者否认唐代士族的存在,或至多以为其处在衰亡的历史阶段,可以忽略不计。而事实上,士族在唐代是客观存在的,其消亡要迟至五代时期,李浩老师就曾在其《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一书中作过相应的比较分析。士族阶层在唐代不但存在,而且正处于一个由转型到消亡的关键时期,而这样一个动态历史过程,不可能不对当时的文学、文化思潮产生一定的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士族的政治偏见逐渐消除,出现了许多研究士族与文学关系的重要成果,如刘跃进先生的《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程章灿先生的《世族与六朝文学》以及李浩老

<sup>①</sup> 参见陈弱水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师的《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令人瞩目。但是,在士族与文学的结合研究中,学界往往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诗歌领域,对文的关注则相对较少,具体到唐代古文运动,更是寥寥无几,除陈弱水先生的《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个社会文化背景》外,似乎只有李浩老师在《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中单列《柳宗元古文思想与关中学术资源》一章,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而从陈弱水先生的研究成果来看,唐代士族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其实是相当密切的,这种关系显然是可以进行深入探讨的。从这个思路出发,尝试对唐代古文运动重新进行宏观考察,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于传统的发现。而唐代士族和古文运动一样长期为学界所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无疑为二者的结合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往往更关注政治、文化等时代的、外部的大环境,却较为忽视与文人直接相关的小环境。而小环境对于文人的影响往往更为具体、直接,许多时代的、外部的大环境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小环境作用于文人的,因此小环境的研究同样值得重视。具体到唐代古文运动的研究上,也是如此。过去,学界在对唐代古文运动进行背景研究时,往往只将着眼点放在政治局势的演变上,而政治局势的演变是如何作用到这些文人身上的,却极少有人说清。通过对家族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深入文人生活的具体环境中,也就能进一步探讨古文家的早期教育及生存状态,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唐代古文运动发生演变的原因与背景。

## 二、概念辨析与研究思路

通过对研究现状及相关反思的总结与分析,本书将主要围绕唐代古文运动时期的骈散关系以及唐代士族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因此,在展开具体研究之前,有必要首先对一些概念进行说明。

既然要对唐代古文运动时期的骈散关系进行讨论,首先就必须对“古文”“骈文”这两个概念加以辨析。在唐代,“骈文”一词尚未出现,这一概念主要

是后人总结与归纳出来的,“清朝别集,始竟以骈文相号召”<sup>①</sup>。那么,界定骈文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在中国古代,长期以“四六”一词指代骈文,而对骈文的界定也常常是众说纷纭。有过度扩大骈文外延的,如清代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其中收入的许多文章其实都是古文的范本;也有过度强调文体界限的,如民国初年王文濡的《清代骈文评注读本》,就将骈赋排除在外,现代学者谭家健等人也继承了这种观点。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将用典、声律、藻饰等某些形式特征作为界定骈文的重要标准,如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骈文史序说》中便举出字句整齐、对偶精切、声律谐调三个条件。相对来说,笔者认为莫道才先生的观点更加妥帖,其在《骈文通论》(齐鲁书社,2010年)一书中提出:“骈文就是基本由对偶的修辞格句子组成的文章。……骈文是从修辞学角度划分出的散文分类概念。……区分骈文与非骈文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一篇作品是否基本由对偶文辞组成。”首先,从“骈”的语意来看,《说文解字》释“骈”为“驾二马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解释道:“骈之引申,凡二物并曰骈。”可见“骈”作为一种文体概念,也应该是以文句的两两相对为主要特征。其次,从古人的创作实践来看也是如此,在某些历史时期,骈文写作并不注重用典、声律及藻饰,而在学界所谓晚唐“骈文复兴”中,骈赋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很难从骈文的序列中将其剔出去。因此,在“骈文”概念的界定上,笔者更认同以对仗作为主要标准。而与之相应的,奇句单行的文章便是散体文了。不过,由于古人并没有今天这样严格的文体观念,因此,也会出现一些不太符合对偶标准的例子,比如《南史·沈约传》中引述的沈约与徐勉书云:“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虽然字数相等、句式整齐,但显然不是对偶。然而按照一般习惯来看,此文仍然应该视作骈文。因此,我们在作文体判断时,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用对偶来“一刀切”。

在确定了骈文的主要判定标准后,还应再作一点补充说明。由于唐代许多文章存在骈散交错的复杂情形,单纯地判断其是否为骈文并不容易。因此,笔者会在需要时借鉴日本学者下定雅弘使用过的“骈文度”这样一个概

<sup>①</sup> [清]孙德谦著:《六朝丽指》,《学海类编》本。

念,以便得出一个可供参考的量化标准。下定雅弘所使用的“骈文度”主要由对偶使用率和四字句使用率两部分组成,“骈文度”即各篇对偶率与四字句率之和的平均值。具体操作可参见其《白居易中书制诰“旧体”与“新体”的分类研究》一文。不过,下定雅弘可能顾及唐代骈文多为“四六”形式,以及制诰本身的文体特点,因此认为:“对偶率与四字句率这两项指标,是判定骈体不可缺少的条件。即使再多对偶,再加上也多用五言和七言,那也不是通常的骈文态。”这与我们判定骈文的标准多少有些出入。因此,本书在使用时可能主要考虑对偶率,即对偶句在整个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有些文章虽然杂有不少单行散句,但如果其对偶率超过50%,则显然更接近于骈文而非“古文”。

除了骈文,另一个需要厘清的概念便是“古文”了。自宋代以降,“古文”作为一种文体概念,主要是指奇句单行的文章,也就是与骈文对立的散体文。但是相对于“骈文”这一概念,古文概念的演化与内涵的变迁无疑是个更为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唐代,当中涉及的许多问题,都和古文运动对待骈文的态度直接相关。因此,笔者将在正文第一章中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展开讨论,此处暂不详述。

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士族。按照学界的一般看法,士族是家族制度的一种特殊类型,萌芽于东汉,兴盛于南北朝,集官宦、社会声望和血缘家族三位于一体。因此,我们判断士族的标准也主要着眼于此,即是否累世为官或在出仕时具有某些特权,是否具有一定的门风与家学修养,是否具有门第婚姻与宗族谱牒等特征<sup>①</sup>。不过,唐代士族正处于转型期,其与六朝士族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在进行具体判定时也就具有其特殊性。毛汉光先生在其《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就曾提到,在讨论北魏士族时,依据《魏书》卷113《官氏志》的标准——累官三世以上且任官需达五品——便基本符合当时的一般情况,可是在讨论唐代士族时,除了仕宦,还必须结合当时社会的实际评价。因此,在采用“三世中有两世居官五品以上”的标准外,还添加了“凡史书皆称

<sup>①</sup> 参见李浩(师)著:《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61~62页。

大族者,虽任官次数甚少,亦属士族范围”这一条<sup>①</sup>。事实上,由于科举制发展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越到唐代后期,家族出身对仕进的影响越小,因此已经很难从仕宦的角度对唐代士族加以界定。而且,从吴郡朱氏出仕者甚少而无损其吴姓士族之首的地位,以及李栖筠父祖不仕而丝毫不影响其门第来看,仕宦在唐代判定士族的标准中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正如何启民在其《鼎食之家——世家大族》中指出的:“与其说是因任官的高下多少,而定世家大族地位之高下,不如说因家族历史的久远光彩为其先决条件,故有世族、世家、世门、世胄之名,而特为世所重。”<sup>②</sup>唐人对士族的判断,可能更多地考虑到世系的久远和文化的传承。因此,本书对“士族”的界定也就相对比较宽泛。毛汉光先生在其《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中曾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广义的士族”,“包含柳芳所说的郡姓、虏姓、吴姓;亦包括正史中所提及的大族;还包括一切三世中有二世居官五品以上的家族,其中有唐代新族——列朝皇室亦包含在内”<sup>③</sup>。本文所使用的“士族”概念即采用毛汉光先生的定义。此外,考虑到史料记载的缺失问题,在处理一些世系相对模糊,但属于士族著姓且明显具有文化传承性的家族时,一般也以士族视之。

除了士族的界定问题,本书还将涉及士族的地域划分,以求更细致地分析其与古文运动的关系。在士族的地域划分上,笔者主要依据柳芳《姓系录》的观点,分为侨姓、吴姓、山东郡姓、关中郡姓、代北虏姓。李浩老师在《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一书中曾对士族的地域划分作过详尽分析<sup>④</sup>,此处不复赘述。

在具体思路方面,本书主要将以唐代古文运动时期的骈散关系以及唐代士族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为中心,围绕士族兴衰对文坛骈散格局的影响,分4个板块展开论述。

第一个板块是对“古文运动”本身进行反思,重新审视古文家对待骈文的

① 参见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36~37页。

② 何启民著:《鼎食之家——世家大族》,第72页,收入《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吾土吾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

③ 毛汉光著:《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第37页。

④ 参见李浩(师)著:《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态度,并进一步探讨造成唐代文人写作时骈散选择差异的原因,以及文体对骈散选择的制约。

从概念内涵来看,在唐代,“古文”一词至少有4个层面的意思:古文字、古文经学、古代文献、散体文。“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观念要到晚唐才逐渐成形,直至宋代才最终确定。韩柳等唐代文人只是讲究文以明道、推崇汉代文章,对于汉代文章中骈俪成分甚浓的——如扬雄《解嘲》,亦在认可之列。从当时的文人交往来看,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古文家与骈文家之间,存在着密切交流,却没有阵营的对立。许多著名的古文家均对骈文家的作品加以肯定,而且自己也写作骈体文章。而从文论上看,古文家文论中虽然存在反骈俪的成分,但明确提及的似乎并不多,更多的人只是反对机巧,针对浮华而提倡质实而已。通过综合比较与分析,可以看出,唐代的文学革新其实包含骈体文和散体文两方面的内容,而且都为后世确立了新的法度。

结合唐代文人尤其是中唐文人的创作情况来看,骈散的选择似乎主要和文体限制和文章的应用场合有关,比如骈文就主要集中在制诰、表启等不掺杂个人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体中。这既是书仪的要求,也出于诵读的需要。中唐以后,文体与骈散选择的关系进一步趋于稳定,形成了新的规范,即古文家用散体写的文体,后世亦以散体为主;古文家用骈体写的文体,后世亦以骈体为主。如历来被视为骈文家的李商隐,其碑志、传状均用散体写作,北宋欧阳修、秦观、曾巩等人的制诰、表启等也仍旧以骈文为主流。事实上,即使在中唐古文运动的鼎盛时期,文坛上骈散文依然不相上下,而在晚唐骈文复兴之时,古文的创作也依然繁荣。可见,在唐代,骈散文始终是共存的,问题仅仅是某一时期哪种文体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已。而通常所谓晚唐“骈文复兴”,其实更应视为某种文风的复兴,而不是文体的复兴。相对于初盛唐和晚唐,中唐文人的文体应用更为广泛,私人化写作更为活跃,这是古文运动兴起并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又与中唐文人的社会角色及知识结构密切相关。而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便是接下来的第二个板块。

第二个板块考量中唐学术对古文运动的影响,主要讨论唐代古文家在经史子学方面的建树及其与古文写作之关系。

中唐时期是一个学术复兴的时期,初盛唐时期相对沉寂的经史之学重新走向繁荣,可据目录书以考其大概。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较为著名的古文家大都有经史方面的著作。从古文家的为官经历来看,时人也并不仅仅将他们视为文人。古文家提倡文以明道,与其博通经史的综合素质有密切关系。而古文家之所以开始大量创作散体文字,也是因为表达自己观点与思想的需要。即使在骈文最盛的时期,经史著作仍是以散体为主,则古文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写作经史著作的习惯带入了文学写作当中。

言及中唐古文运动,往往提及韩愈及其门生弟子组成的文学团体,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共同的文学追求与主张为基础。通过对韩愈与李翱、张籍关系的考察,以及韩愈对“师道”的理解和对“弟子”的评论来看,将其单纯地视为文学集团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韩愈集团的性质似乎亦需重新定位。而在这个基础上,则可以进一步尝试对韩愈解经方法进行探讨,以考察其与文学思想的关系。

第三个板块是对古文家的出身背景进行考察,围绕其北方旧士族的背景探讨其文化品格与文章写作。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这一部分内容首先对柳宗元的《先友记》和《铁炉步志》两篇文章进行深入解读,考察北方旧士族在古文兴起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现象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在北方旧士族的圈子里酝酿发生的。从古文家的早期成长环境,到其成年后交际、论文的对象,均可看出这一文化背景产生的影响。北方旧士族的家学传统对古文家价值观、文学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唐代古文运动体现出一定的家族传承特征。而旧士族在政治上的浮沉对古文运动的进程也有深刻的影响,其中身处政权核心之外的旧士族子弟,在立言方面表现得尤其积极主动。

虽然古文家多出身于北方旧士族,但如果仅仅将古文兴起归结于此,可能也不太妥当。事实上,通过韩愈与裴度的分歧等现象来看,韩、柳等人,尤其是韩愈,已经超出了北方旧士族的传统文化观念,正是这种超越才真正成就了“古文”,使得“古文”具备了与骈文分庭抗礼的艺术性。而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是创作主体本身的一些特点,比

如韩愈,其为人颇有双面色彩,一方面将“道”看得非常重,而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市井特色,轻浮躁竞,其作风迥异于传统士族,这无疑使得他在具体创作中不会固守传道明道的藩篱,而是大胆尝试一些戏谑、怪奇的风格。其次是尝试逆向思维,历来谈韩愈时往往提到他“以文入诗”,但事实上,韩、柳的古文佳作也往往具有“以诗入文”的特点,尤其是个性与情感的注入,大大提高了其古文的感染力和艺术性。再次,由于受文学变革与儒学变革的交互影响,韩、柳等人既是文章大家,又是新儒学的关键人物,自然不再受旧传统局限。

最后一个板块则将目光下移至晚唐,通过分析唐代科举制度和考察晚唐文人的生存状况,对所谓“骈文复兴”进行重新考量。

首先需要重新审视的是科举与古文的关系。受士族传统观念影响,除韩愈外,古文家似乎并不太注意利用科举制度,反而对这一制度颇多诟病,这对古文的推广无疑是很不利的。同时,唐代科举制度本身也对古文的成长多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骈文的流行,但若跳出骈散之争的窠臼,从宗经明道的角度来观察,则制度本身对古文并没有太大的限制。此外,尤可注意的一点是,元和、长庆以降,旧士族越来越习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以保持门第,进而试图把持科举,由长庆科场案即可见一斑。因此,一方面,旧士族对经史之学的热情逐渐减退;另一方面,普通士人的生存境况也趋于恶化。而这些均对“骈文复兴”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晚唐时期,许多士人多年应举而未得一第,蹭蹬仕途,穷困潦倒,应举的开销与生存的压力促成了紧迫的经济需求,故而纷纷以文谋生,而大量骈体表状和墓志的兴起适逢其时。幕府书记往往需要文采而不是学问,通过对晚唐无功名之人幕者及长期辗转于幕府间不得升迁者进行考察,即可看出这种影响。中晚唐曾有争作墓志的现象,而丰厚的润笔对于穷困潦倒的文人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样的墓志文易趋于浮夸和藻饰,也就更适宜于骈文。通过考察晚唐碑志文风的情况,即可看出这类文学消费对骈散文消长产生的影响。

# 目 录

绪 论 .....	1
一、研究史回顾及反思 .....	1
二、概念辨析与研究思路 .....	6
第一章 唐代古文运动与骈文之关系 .....	13
一、“古文”概念的形成及其与骈文对立 .....	13
二、小议古文家的反骈理论 .....	19
三、古文家的骈文创作及其与骈文家的关系 .....	32
小结 .....	39
第二章 对唐代古文运动性质的重新审视 .....	40
一、文体限定与骈散选择 .....	40
二、“古文运动”的两个层面 .....	50
三、对古文运动的定位及晚唐骈文复兴 .....	68
小结 .....	76
第三章 古文家与中唐学术 .....	77
一、对古文家身份的定位 .....	77



二、经、史、子的熔铸与文章的变化 .....	87
三、中唐文人学术与南朝之比较 .....	102
小结 .....	109
<b>第四章 “韩门弟子”考议 .....</b>	<b>110</b>
一、“韩门弟子”概念辨析 .....	110
二、韩愈与李翱、张籍的关系及其师道 .....	116
三、韩愈与“弟子”的讨论重点 .....	125
四、韩愈的解经方法与文学思想 .....	133
小结 .....	139
<b>第五章 古文运动发生的小环境 .....</b>	<b>140</b>
一、柳宗元《先友记》发微 .....	142
二、“先友”及古文家的出身分析 .....	156
小结 .....	178
<b>第六章 古文运动发生的大背景 .....</b>	<b>180</b>
一、从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谈起 .....	181
二、士族地位的动摇与古文运动的兴起 .....	190
三、关陇集团的焦点透视 .....	208
小结 .....	215
<b>第七章 古文运动对士族传统的突破 .....</b>	<b>217</b>
一、奇正之间：从载道到游戏 .....	218
二、以诗为文：从载道到文艺 .....	235
三、儒学变革与文学变革的双线合一 .....	242
小结 .....	246